

# 出席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考

吴元康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北洋皖系集团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53)

**摘要:**1925年春,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会议开幕前夕,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予以抵制,但后来仍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出席善后会议。然而,究竟有多少国民党党员出席过善后会议,一直没有弄清。去年杨天宏先生撰文提出“9人”说。实际上,出席过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应为12人。

**关键词:**国民党党员;善后会议;出席人数

**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1)04-0061-03

1925年春,段祺瑞召集由各派政治势力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北京政变后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因与段祺瑞存在难以弥合的政见分歧,国民党于善后会议开场前夕,通告各党员不得列席善后会议,仍有部分国民党党员违背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出席了善后会议。但究竟有多少国民党党员出席了,一直未弄清楚。早在国民党二大期间,针对处分参加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一事,与会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对彭养光、马君武等众所熟知者,“应即开除党籍”,对于“其未知名者,亦应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一并开除”<sup>①</sup>。可能因为涉及到少数国民党政要,所谓调查一事,一直未见下文。2000年杨天宏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发表《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一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从有关善后会议的报道来看,实际出席者计有彭养光、冯自由、马君武、石青阳,以及熊克武的代表张铮、樊钟秀的代表唐瑞铜、杨希闵的代表卢启泰、范石生的代表邓之诚、胡思舜的代表李岳渊等9人。”杨先生立论所据的报道,一为1925年2月3日天津《大公报》的《国民党与善后会议》一文,经查,该文提及彭养光于善后会议开幕日即2月1日到会一事;一为1925年2月10日天津《大公报》的《善后预备会开会纪》一文,此稿报道了2月9日善

后会议预备会的具体情况,其中提到在讨论议长副议长问题时各代表争辩激烈,马君武、冯自由退席。至于杨先生所提到的另外6人,则来源于1925年2月11日《顺天时报》的《国民党决定出席善后会议》一文,该文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冯自由等人斡旋,另行决议,加入善后会议,同意石青阳等6人嗣后一致出席。其实,这篇报道并不可信。国民党中央已于1月底作出了抵制善后会议的决定。2月10日,又通电全国,号召人民自动制订国民会议组织法,公开与段祺瑞唱对台戏,又怎么可能同意参加善后会议呢?<sup>②</sup>退一步说,即使上篇报道可靠,究竟石青阳等6人以后是不是均出席过善后会议呢?毕竟同意参加与实际列席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对此杨先生未作进一步的考证。因此,杨先生文中出现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具体来说,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失误。

其一,弄错代表1人。樊钟秀的代表并非唐瑞铜,应为王鼎洛。早在1925年1月15日,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414页。

② 参见拙文:《孙中山何时公开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

樊钟秀致电善后会议筹备处处长许世英,“善后会议兹特派王旅长鼎洛代表列席参与会议,请予接洽”<sup>①</sup>。2月1日,王鼎洛代表樊钟秀出席了善后会议开幕式<sup>②</sup>。2月3日,善后会议谈话会,赵尔巽等70余人联名提出“请政府通电全国停止军事行动意见书”,其中列有王鼎洛的名字<sup>③</sup>;2月5日,《申报》发表一则《北京通信》,再次确认樊钟秀的代表为王鼎洛;2月13日下午,善后会议第一次大会召开,在出席人员的名单中,樊钟秀的代表仍为王鼎洛<sup>④</sup>;以后王鼎洛多次代表樊钟秀出席善后会议大会<sup>⑤</sup>。值得补充的是,笔者遍查公报及当时各大报刊,均未发现樊钟秀中途改派代表的函电,上述材料充分证明,在樊钟秀的代表问题上,提供《国民党决定出席善后会议》新闻稿的通讯社并未调查确实,杨先生未加深察,致以讹传讹。

其二,虚增1人。杨先生将石青阳列入出席过善后会议的人员名单。此说实误。善后会议开幕前夕,石青阳自上海致电许世英,报告北上进程,似有赴京亲自出席善后会议的意向<sup>⑥</sup>,但2月2日到达北京接到国民党中央通告后,他就改变初衷,“为贯彻民党主张不加入善后会议”<sup>⑦</sup>。3月16日,在善后会议第七次大会上,代理善后会议秘书长李宛鸣向大会报告善后会议开幕以来一直未能出席善后会议的会员名单,其中列有石青阳<sup>⑧</sup>。那么,石青阳是否出席过以后的大会呢?笔者查阅《善后会议公报》第7、8、9三期所载第8—22次大会的“速记录”,均未发现石青阳的名字,说明善后会议第8—22次大会,石青阳也从未出席过。另外,国民党二大曾通过《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其中一项系针对“列名西山会议诸人兼有其他违犯党纪行为者”,关于石青阳,仅指出其“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且勾结军阀”,并未提到他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sup>⑨</sup>。这为石青阳未出席善后会议提供了重要佐证。

其三,遗漏4人。杨先生在考察出席过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时,所据资料的时间最晚仅至1925年2月11日,而善后会议首次大会是在2月13日召集的,因此,杨先生对于善后

会议共计22次大会的出席人员名单是否查实,很难说。其实,除了冯自由、彭养光、马君武亲自出席善后会议,熊克武派代表张铮、樊钟秀派代表王鼎洛、杨希闵派代表卢启泰、范石生派代表邓之诚、胡思舜派代表李岳渊列席过善后会议外,尚有4位国民党党员派代表参加了善后会议,他们是:

1、柏文蔚。作为国民党的资深党员,柏文蔚不仅是广东方面的建国军第二军军长,而且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1月18日,柏文蔚复电许世英明确表示“善后会议关系国家大计,自应遵照到会,惟尚因他事不在京亦当临时陈明,委派全权代表”<sup>⑩</sup>。善后会议开幕前后,柏文蔚穿梭于河南、北京等地,分身乏术,为此他又致函善后会议筹备处,提出“蔚现因公出京,开会未能列席,特派常恒芳为全权代表”<sup>⑪</sup>。3月10日,善后会议第六次大会,出席会议的名单首次出现柏文蔚的代表常恒芳<sup>⑫</sup>。以后,常恒芳又多次以柏文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善后会议议席上。

2、方声涛。作为广东方面的要人,方声涛1924年4月被孙中山委任为福建省省长兼闽

① 善后会议秘书厅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公文·电三”。

② 《新华门内堂会开幕》,1925年2月2日《晨报》。

③ 《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议案”。

④ 《善后会议公报》第2期,“议事录”。

⑤ 参见《善后会议公报》第3、4、5、6、7、9期,“速记录”。

⑥ 《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公文·电三”。

⑦ 《孙科李烈钧等来京》,1925年2月3日《晨报》;《国内专电·北京电》,1925年2月4日天津《大公报》。

⑧ 《善后会议公报》第6期,“议事录”。

⑨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⑩ 《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公文·电三”。

⑪ 《善后会议公报》第3期,“公文”。

⑫ 《善后会议公报》第6期,“速记录”。

省民军总司令<sup>①</sup>。1924年9月,广东所属军队一律改称建国军,孙中山又改委方声涛为建国闽军总司令,同时因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出访日本,孙中山又命方氏代理此要职<sup>②</sup>,长达9个月,参与策划了北伐、东征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善后会议开幕不久,他在上海致电许世英,“声涛一时未能北行特托林君知渊史君家麟代表列席”<sup>③</sup>。但按照善后会议的有关规定,方声涛只能由一人代表出席,结果,林知渊代表方声涛出席了善后会议第3、4、8、9、10次大会<sup>④</sup>,而自4月6日善后会议第11次大会起,则改由史家麟代表出席<sup>⑤</sup>。

3、李宗仁。许世英筹备善后会议前夕,李宗仁联络黄绍竑,击败旧桂系首领陆荣廷,占领了广西大部分地区,并于1924年12月就任广东大本营所委任的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sup>⑥</sup>。因而被聘为善后会议会员。但善后会议前后李宗仁是不是国民党党员?目前史学界关于李宗仁何时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在1923年冬,另一种则认为是在1924年冬(这一问题待另文考证)。尽管这两种见解歧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1925年2月善后会议开幕前后李宗仁的国民党党员身份不容置疑。善后会议召集期间,李宗仁正在对付广西另一地方首领沈鸿英,不可能北上与会,因此他派严端代表自己出席善后会议。2月27日,善后会议第4次大会严端首次代表李宗仁出现在会场上<sup>⑦</sup>,以后又出席过第5、6、7次大会。

4、黄绍竑。同李宗仁一样,黄绍竑也是从旧桂系集团中游离出来的将领。他自1923年5月接受孙中山的命令援助西江革命联军起,即

站在革命旗帜之下<sup>⑧</sup>。1924年11月,他在广州正式加入国民党<sup>⑨</sup>,12月,在南宁就任广西全省绥靖处会办。1925年2月13日,他委派的代表蒙经出席了善后会议首次大会<sup>⑩</sup>。以后蒙经又代表黄绍竑,多次出席善后会议。

总之,实际出席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应为12人,他们是:彭养光、冯自由、马君武,以及熊克武的代表张铮、樊钟秀的代表王鼎洛、杨希闵的代表卢启泰、范石生的代表邓之诚、胡思舜的代表李岳渊、柏文蔚的代表常恒芳、方声涛的代表林知渊(后为史家麟)、李宗仁的代表严端、黄绍竑的代表蒙经。

**作者简介:**吴元康(1965— ),男,安徽宿松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北洋皖系集团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② 《方声涛代理参谋部长》,1924年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

③ 《善后会议公报》第3期,“公文”。

④ 《善后会议公报》第4、7期,“速记录”。

⑤ 《善后会议公报》第7、8期,“速记录”。

⑥ 《李宗仁黄绍竑就职》,1924年12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

⑦ 《善后会议公报》第4期,“速记录”。

⑧ 《两广统一运动的经过》,《政治周报》第8期。

⑨ 黄绍竑:《五十回忆》上册,云凤出版社1945年印行,第80页;另参阅《李黄为广西绥靖督会办之反对声》,1924年12月29日《申报》。

⑩ 《善后会议公报》第2期,“议事录”。